

西方思想经典选读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乔国强 教授

2008-2009学期

2006 9 11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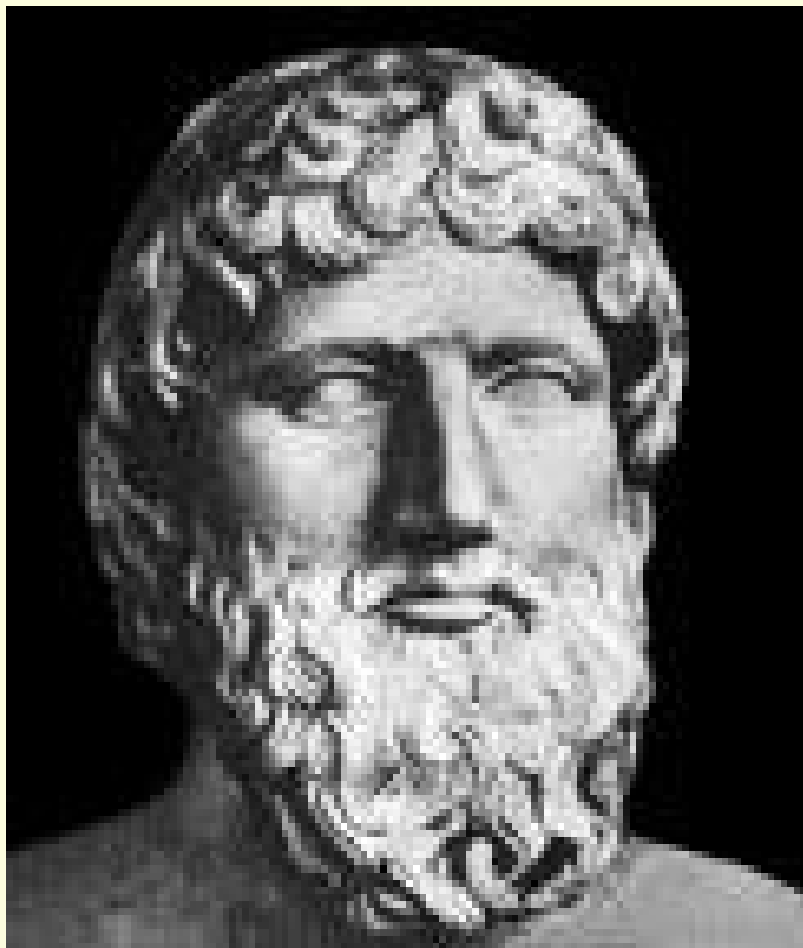
西方思想发展的大概脉络

西方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对其进行简单的概括和分期并非易事。不过，为了便于学习，我们在此尝试做一个粗略的概括和梳理。古希腊、古罗马是西方思想的源头，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不仅喜欢对现实中的一般的事情进行思考，而且还喜欢将其所思所想进行概括、升华，找到最为抽象的概念和原理，以探索何为世界的真正本原。米利都学派的“始基”、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本体等都以寻求万物最后的本质为特征。这种对世界总体的最一般的概括的学问叫做“本体论”（ontology）。到了中世纪，西方人的本体论有了一定的变化，他们把神看作世界的本体，是把万物统一起来的绝对的最高的存在。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思想很复杂，具体的流派和观点非常多，但总体上看他们有着重本体论的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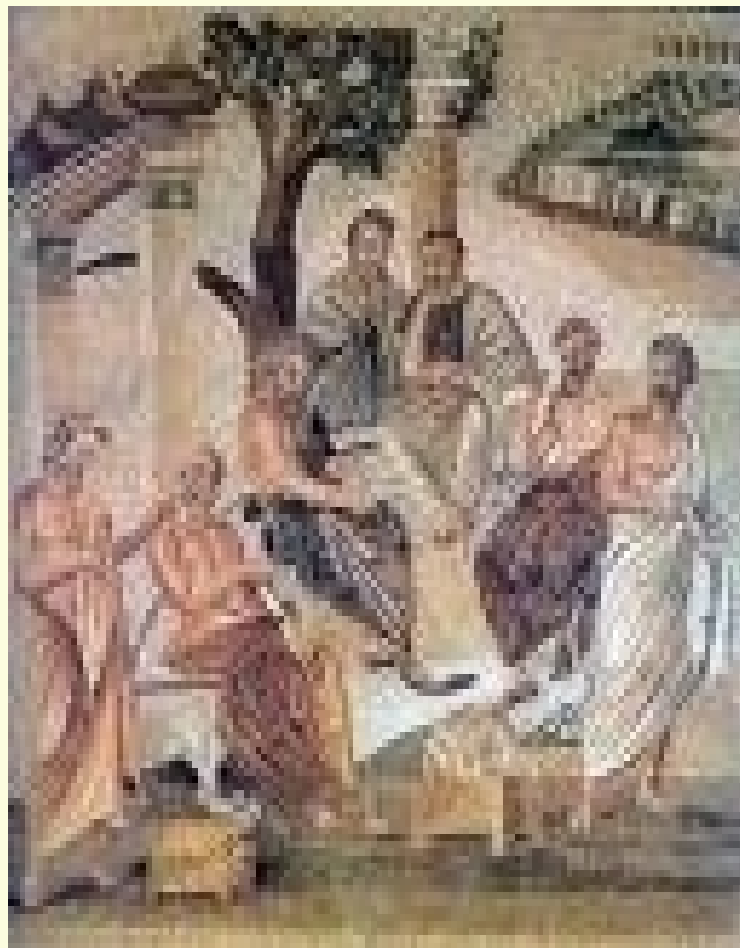
文艺复兴之后直到19世纪，西方思想的核心转向了认识论的问题，他们更加关心认识的过程和方法、获取真理的途径以及知识的可靠性和真理性等等。这一转向始自法国的笛卡尔，后被大陆的理性主义者和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共同加以发展，并在德国古典主义时代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英国经验主义者主要包括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等。培根的《新工具》强调了“归纳”在科学中的作用，弥补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只重演绎推理的偏颇，是经验主义的里程碑式著作。霍布斯、洛克对理性主义的“天赋观念”说进行了批评，强调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了经验主义的思想。休谟认为，所谓的因果关系只是经验的重复，即两者经常在时间中相继出现，以至于使那些轻信的人断定，前者的出现肯定会引起后者的出现，把两者的关系看作是必然的，还会在将来保持不变。休谟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必然联系，因为相继出现过一万次的两件事情，完全有可能在一万零一次的时候停止相随，就是无数次升起过的太阳也不能保证明天还会升起，总要到来的不升起的时刻，说不定在明天就会出现。

欧洲大陆理性主义思想的奠基人笛卡尔积极地寻求通向真理的途径，仔细考察了知识的可靠性、清晰性和明确性。为了找到准确无误的知识，他主张怀疑一切可以怀疑的东西。在不断地批评和否定之后，他发现原先被人们看作非常确定的知识都经不起推敲，只有那个能够怀疑一切的理性主体是不可怀疑的。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者还包括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伏尔泰、卢梭等。到了德国古典主义时代，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等把理性主义思想推向了高潮。与经验主义相比，理性主义更有深度和系统性，但没有经验主义那么接近现实，有时难免有教条主义的倾向。

除了认识论之外，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所关心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叔本华探讨了意志和表象的问题、尼采探索了超人意志以及克尔凯郭尔批判了思辨哲学，研究了“生存境界”，等等。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思想界有一个语言学的转向。在20世纪末又出现了一个文化转向。由于这两个转向离我们比较近，而且我们也没有选这两个领域的文章，所以不在此介绍。



柏拉图 (Plato, 公元前
427—前347)



柏拉图与学园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出生在一个古老的雅典名门家庭，是古希腊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在许多领域都有里程碑般的建树。他小时候喜欢绘画和文学创作。大约在二十岁时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四十岁之时，他曾前往叙拉古，试图说服那里的统治者狄奥尼修一世采用他的政治主张，但惨遭失败。同年回到雅典，创立举世闻名的学园（Academy）。此后主要在学园里从事教育和研究，直到去世。有关他投师苏格拉底一事，有个美丽的传说。在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中有这样的记载：一天晚上，苏格拉底梦见一只小天鹅停在他的膝盖上，然后发出嘹亮美丽的声音并一飞冲天；第二天柏拉图前来投师，苏氏把柏拉图看作他梦见的那只天鹅。这个故事未必属实，但起码说明了这两位伟大思想家的关系非同一般，在希腊人心目中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他在公元前387年创办的学园，坐落在雅典城的西北角的阿卡德摩（Academus），持续了九百多年，于公元529年被迫关闭。学园集中了当时在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地理学、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顶尖专家，培养出了大量的杰出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弟子为亚里士多德。学园的学术水平、社会影响、历史跨度等都是无与伦比的。

柏拉图的著作主要包括《理想国》、《巴门尼德篇》、《会饮篇》等40多篇对话，以及13封书信。柏拉图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之大是无法估计的。黑格尔曾说：“哲学之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他们比起所有别的哲学家来应该可以叫做人类的导师。”英国哲学家怀特海甚至说：“欧洲哲学传统的最没有争议的一般特征是：它由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释组成。”

《理想国》（*Republic*）是柏拉图的最有名的著作。标题的希腊语为 *politeia*，指的是“关于城邦的学问”，兼有“对城邦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两层意思。很多研究哲学的专业人士都把这个题目译成《国家篇》，虽然比较忠于原意，但也只表达了前一种意思，却无法体现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阐述的有关人的教育问题。现在的英语名称来自拉丁译名 *De Res publica*，但这里所谓的 *republic* 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与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望文生义。虽说这个标题本身并没有理想的意思，但柏拉图在对话中的确描绘了一个相当理想化的国家，所以最早翻译这本书的吴献书、郭斌和、张竹明都意译为《理想国》。这一译名已经被广泛地接受，所以我们仍然沿用这一名称。

《理想国》是当时的学术大全，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诗学等学科的专家，纷纷把这部著作列为自己领域中的里程碑。由于当时的学术还没有明确的分科，所以这部著作的覆盖面很广。如要全面了解这本书，应当阅读全文。这里的片断选自《理想国》的第7卷，展现了柏拉图的著名的“洞穴”比喻。

柏拉图运用丰富的想象能力，构思出一个如此奇特的地方。有一个很深的洞穴，洞中的人世代居住在这里，被铁链锁在固定的地点上，连脑袋都不能转动，眼睛只能看着洞穴最深处的洞壁。他们的后面有一堆火，在火和人之间，有一堵矮墙，墙的后面有人举着各种器物和雕像走来走去，火光将这些物体投影到囚徒面对的墙上。他们由于没有见过真实的东西，只能把影像当作事物本身。他们每天好像都在看皮影戏，已完全习惯于这种生活，没有人试图改变现状。洞穴的情况如下图所示。

洞口

火

举着雕像的人

矮墙

囚徒

影像

如果有人把其中一个囚徒释放出来，并强迫他看火光和真实的东西，他肯定会感觉十分痛苦，在眼花缭乱的情况中无法看清实物，认为影子是更为真实的东西。如果有人硬将他拉出洞穴，在强光之下他必然感到眼睛疼痛，什么也看不清。若要他适应新的环境，需要一定的时间。柏拉图借用苏格拉底的口说：“首先他看影子最清楚，其次是人和其他物体在水中的倒影，然后才是真实的物体本身。接着他可以对着天体和天空本身大饱眼福，当然这种事情在晚上更容易做到：他将看月亮和星星的光，而不是在白天看太阳和阳光。”这个人一旦看清了太阳，他就会庆幸自己摆脱了原来的黑暗的洞穴，来到了阳光普照的世界。外面的世界象征着本质的世界，用柏拉图的话来说是理念（idea）的世界；太阳代表着善，是最高的理念，是万物的本原。柏拉图在这里所主张的就是撇开表面现象，看到事物本身，再上升到最为本质的理念。他的这种学术方法对西方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怀特海把西方学术看作柏拉图脚注。

柏拉图把理念的世界看作明显高于现象的世界，一旦步入这个世界，就不屑于回到原来的地方，因为“那些已经达到这种境界的人不愿俯身处理人类的事情：除了这个更高的世界之外，他们的灵魂哪儿也不想呆”。这就给柏拉图哲学带来了明显的出世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他同时还有着非常入世的一面。这个摆脱了愚昧的人虽然很不愿意回到洞穴里，但还是要硬着头皮回到那里去。看到了光明和事物本身之后，他一下子还适应不了洞穴的生活，难以辨别洞穴里的影子，也有点不屑于那些囚徒所谓的智慧。但那些囚徒根本不能理解他，他们嘲笑他，甚至还威胁他，正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人们会说，难道他上去了一趟就把眼睛弄瞎了吗？难道不是根本不值得上去吗？如果可能的话，难道他们不会抓住并处死任何试图把他们释放并带到上面去的人吗？”这是苏格拉底殉身真理的写照，也表现了柏拉图为理想而奋斗终生的精神。他曾三次前往叙拉古试图说服那里的僭主狄奥尼修一世和狄奥尼修二世采用他的政治主张。结果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次被带到奴隶市场上出售，幸亏有人把他赎回来，另外两次也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危险。尽管如此，他对理想的追求并没有放弃，他坚信，“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柏拉图敢于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是非常可贵的。不过，在最愚昧的地方实践最前沿的理想是注定了要失败的，也许折中一点更有现实意义。而且，所谓的本质往往是以牺牲丰富性为代价的，海德格尔认为这样的真理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种遮蔽。按照这样的观点去实践必然会有一定的弊端。此外，柏拉图过于强调哲学家的善意的屈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圣人的自我牺牲之上，完全否定政治家的功利主义的行为。他说：“不，事实是这样：将要执政的统治者越不愿意从政，其国家治理得到越好，越没有分歧，但统治者越渴望从政，其管理最差。”政治家为自己的荣誉和利益而忙碌固然有不少弊病，但不考虑政治家的利益，只讲大思想家的奉献，可能是苍白无力的。在这个问题上，黑格尔比他更有洞见，他把恶看作历史发展的杠杆，离开这种力量，历史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包含着非常深刻的道理，而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是将哲学与文学熔为一炉的典范。我们应当从“洞穴”比喻获得启发，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修养，摆脱愚昧的状况。用我们中国话来说，就是不要做井底之蛙。

柏拉图的文艺思想

柏拉图并无系统的文艺理论专著，在《理想国》只是附带提及文艺，《对话录》也不是专门探讨文艺问题的，采取的是漫谈、辩论的方式。但是，柏拉图对文艺的见解和看法接触到了文艺和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西方文艺理论史上影响深远，不容忽视。柏拉图接受先辈哲人的模仿说，承认文学艺术模仿现实世界。但是，他所理解的现实世界，又是理念世界的模仿。理念世界第一性，现实世界第二性，艺术世界第三性。艺术世界只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三层”，永远低于现实世界，更低于理念世界。中世纪的神学就把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予以发挥，用理念世界来论证“彼岸世界”的存在。柏拉图还把艺术作品的创作归结为神赐迷狂，文艺的社会作用只能激起人的情欲，使人卑劣，因而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实际上，柏拉图心目中的文艺有不同等级，高尚的文艺是神赐的低劣的文艺是模仿的。但柏拉图期望文艺使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于人有益，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极大。

神灵凭附说

.....因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作诗或代神说话。诗人们对于他们所写的那些题材，说出那样多的优美词句，像你自己说荷马那样，并非凭技艺的规矩，而是依诗神的驱遣。因为诗人制作都是凭神力而不是凭技艺.....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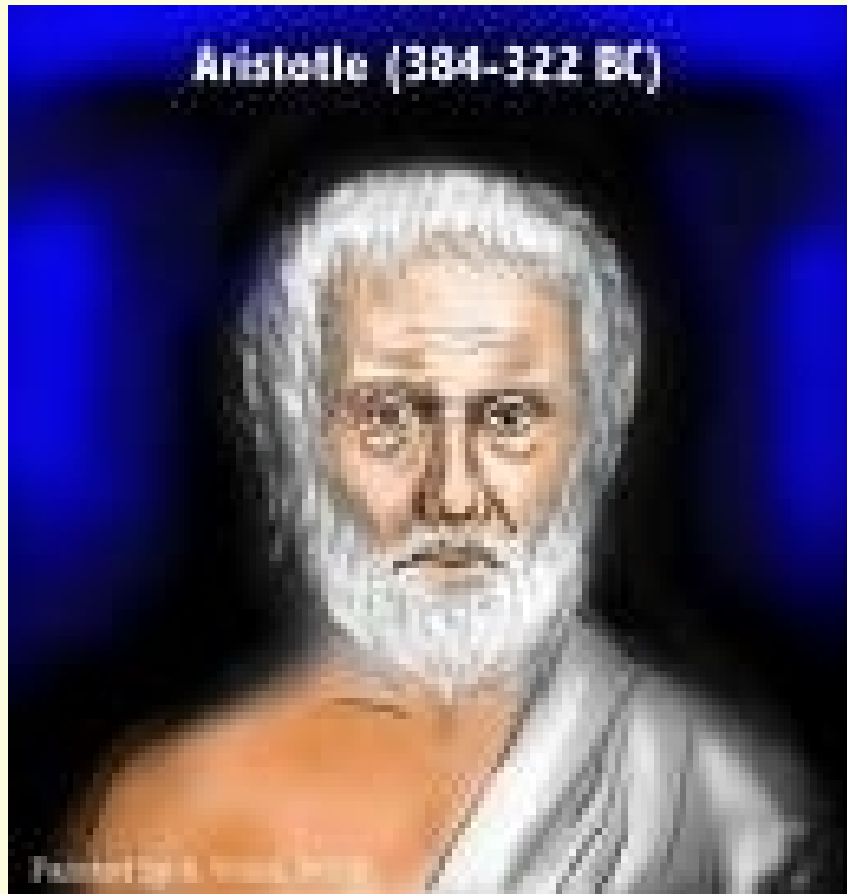
柏拉图：《伊安篇》

模仿的本质（柏拉图《理想国》）

神



- 自然中本有的（神制造的）
- 木匠制造的
- 画家制造的



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
384-前322年)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幼年父母双亡，由亲戚抚养成人。他在17岁时来到雅典，在柏拉图的学园学习，后来在这里从事研究和教学，直到柏拉图去世，长达20年之久。他曾应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邀请，担任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老师。亚历山大征服雅典后，亚里士多德回到雅典并在吕克昂（Lyceum）建立了一所学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派——漫步学派（Peripatetics）。亚历山大大帝逝世后，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并在次年去世。

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著作包括：《形而上学》、《尼各马科伦理学》、《政治学》、《修辞学》、《诗学》、《物理学》、《工具论》等。罗素对亚里士多德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死之后一直过了两千年，世界才又产生出任何可以认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敌的哲学家。”罗素甚至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之大，束缚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他说：“直迄这个漫长时期的末尾，他的权威性差不多始终是和基督教教会的权威性一样地不容置疑，而且它在科学方面也正如在哲学方面一样，始终是对于进步的一个严重障碍。”

亚里士多德与《诗学》

亚里士多德是逻辑学的创始人，古典形式逻辑的奠基者，写成了欧洲第一部逻辑学著作《工具论》。他从形式逻辑角度研究了概念、判断、推理及其思维定律，还触及到辩证逻辑问题。恩格斯说他是“古代世界的黑格尔。”正因为亚里士多德是自然科学家和逻辑学家，所以他很重视科学研究中的方法论。他抛弃了柏拉图等人运用的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对客观世界进行冷静的客观的科学分析。方法论的转变，使他成为古代希腊第一个用科学的观点、方法研究美学、文艺问题的人。

柏拉图以理念为哲学基础，从否定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来否定文艺的真实性。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只不过是使用空虚的语言和诗意的比喻而已，”除了使问题更复杂，根本不能用来解释世界。

艺术与现实之
间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理念论”及其模仿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模仿说。《诗学》开宗明义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模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模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模仿”是《诗学》的中心概念和出发点，是亚里士多德艺术理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不仅仅是恢复了古希腊的传统看法，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因之模仿现实世界的文艺也是真实的，他的模仿说比后者要深刻得多。在他看来，宇宙间每一个别事物都是物质与形式的统一，而物质是潜能，形式是实现，从潜能变成实现是万物的创造行为。因此模仿不是抄袭事物的外形，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突破了“艺术模仿自然”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提出艺术模仿的是“行动中的人”，实际上是以现实的人生为艺术模仿的对象，把传统的模仿说提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另外，模仿的本质在于通过个别表现一般，通过特殊表现普遍，它不仅反映现实世界的个别表面现象，而且揭示生活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而艺术比普通生活更高更真实更美。

艺术的社会作用

柏拉图认为，诗人专门挑动人的情欲，滋养观众、听众的快感——“感伤癖”和“哀怜癖”，而情感只不过是人性中卑劣的、无理性的部分，是应该加以压抑、节制的，否则就会破坏城邦的“正义”。亚里士多德从自己的伦理思想出发，为诗人进行辩护。他认为，情感、欲望是人性中固有的，是人的特殊本质、即人的功能的表现，有权利要求得到满足；但人的功能还表现为能过有理性的生活，所以人们在追求快乐和幸福时，情感要以理性为指导。

《诗学》第十三章指出，正是由于理性的指导，才使观众怜悯某些人物，发生恐惧之情，或不怜悯某些人物，不发生恐惧之情，从而驳斥了柏拉图的所谓“感伤癖”和“哀怜癖”。

关于悲剧

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表演），而不是采取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在悲剧的定义中，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应当“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引起怜悯与恐惧之情，这是悲剧独特的快感，它使人们的思想感情得到陶冶，产生好的影响与作用。“陶冶”原文“Katharsis”（英文：Catharsis）

悲剧的作用
——
陶冶说

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悲剧主角“过失说”：“怜悯是由一个人遭受的厄运引起的，恐惧是由这个这样遭受厄运的人与我们相似引起的……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运，不是由于它为非作歹，而是由于他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忒斯以及出身于他们这样的家族的著名人物。”

整个悲剧艺术的成分必然是六个——悲剧艺术是一种特别的艺术（即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与歌曲），其中之二（即言词和歌曲）是摹仿的媒介，其中之一（即形象）是摹仿的方式，其余三者（即情节、性格和思想）是摹仿的对象。六个成分里，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因为悲剧所摹仿的不是人，而是人的行动、生活、幸福……

《尼各马科伦理学》是亚里士多德的重要作品之一。尼各马科本来是亚里士多德的儿子的名字，他用自己儿子的名字给自己的伦理学著作命名。这部著作探讨的最核心问题是，怎样培养出完人（perfect man），并让他获得至善（highest good），以便享受最大的幸福（happiness）。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亚里士多德分别探讨了勇敢（courage）、慷慨（magnificence）、机敏（wittiness）、友爱（friendship）、公平（justice）、理性（reason）等概念。

本书所选的内容出自该书的第三卷，探讨了什么是勇敢。亚里士多德在文章的开篇强调说，勇敢是“在恐惧和鲁莽之间的中间状态”。勇敢并不是什么都不怕，惧怕也不见得就是坏事，例如说，“一个人并不因为惧怕给妻子或者孩子带来侮辱，或者妒忌，或者如此之类的任何事情而成为懦夫，也不因为在挨鞭子时能忍耐而成为勇敢。”一个鲁莽的人虽然看起来很像勇敢的人，好像天不怕地不怕，可一旦意识到自己的盲目性，他在不可抵抗的势力面前还会退缩回来，与怯懦者殊途同归。怯懦的人的问题在于不该害怕的时候却没有足够的勇气。而勇敢的人却不一样，在该胆大的时候就胆大，在该害怕的时候就害怕。

亚里士多德说：“所以怯懦的人、鲁莽的人和勇敢的人面对的对象完全相同，但与对象的关系不一样，前两者分别是过度 and 不及，后者则恰得中间，处在应该处的状态中。”可见过多和过少的勇气都不好，不如恰到好处得中间。

亚里士多德还接着分析了五种勇敢的方式。第一种是“公民的勇敢”，尤其体现在自觉地为自己的国家战斗的行为。这种行为正是出于对荣誉的追求，对耻辱的不屑，是由德性促成的。当然打仗的时候，将领也常常采用强迫的手段来促使士兵投入战斗。亚里士多德虽然认为强迫本身与勇敢是相矛盾的，但他还是同意将这种行为列入勇敢的行列。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观念有着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认为能够起到保卫祖国作用的被迫参与战斗的行为也是勇敢的表现。第二种勇敢在于“经验和技能”。许多人因为这方面的优势而不会害怕，用我们的谚语来说，就是“艺高人胆大”。但这种人一旦发现仅仅凭借以前的经验对付不了眼下的难题时，就会失去自信，从而变为胆怯，因为这种行为毕竟不是出自德性本身。

第三种勇敢是出于“动物般的激情”的驱动。如果只靠激情未必能够导致勇敢，否则“饥饿的驴也是勇敢的，虽然遭到鞭打，却不肯停止吃草；渴欲也可使奸夫做出许多勇猛的事情。”所以激情还应当加上“道德的选择和恰当的动机”，才能真正孕育出勇敢的行为。虽然激情本身和勇敢有一定的区别，但伟大的行为也往往需要借助于激情的作用，这样更有利于伟大目标的实现。此外，乐观的人和对危险无知的人也似乎挺勇敢，但他们一旦意识到了真实的危险，就难免逃跑。当然，无知者和乐观者的勇敢程度还是有着一一定的区别，前者不如后者，“他们没有自知之明；乐观者有一定的自知，能够坚持战斗到一定的时候；但蒙在鼓里的无知者一旦知道情况不跟他们想象的一样就马上逃跑”。总的来看这两种人的勇敢都是比较有限的。

在这个选段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不少有意思的观点，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勇敢的定义：勇敢是鲁莽和怯懦的中间状态。这是一种很成熟的智慧，不盲目地提倡胆大。这种智慧在古代中国也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古人称之为“中庸”。孔子与子贡曾经有这么一段对话：“子贡问：‘师与商也，属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³根据孔子的意思，过贤与不贤是同样不符合中庸之道的。《论语》还有这样的记载：“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叩其两端而竭焉”指的是尽可能地把事物的两个极端探索出来，以便找到那个恰到好处中庸。可见孔子的中庸之道与亚里士多德的mean有着相通的地方，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中庸之道曾经遭到很多人的批评，有时甚至被当作平庸的同义词，但这种否定有简单化的嫌疑。最近中庸又受到了重视，其合理部分得到了肯定。

亚里士多德对勇敢的探讨采取了条分缕析的方法，精确地辨别了勇敢以及和勇敢相关的概念的含义。古希腊人非常精于分析，亚里士多德尤其如此。这种注重分析的方法一直影响到整个西方学术传统，并且不停地被后人加以发展。



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公元
354—430)

生平：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公元354—430）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著名大师，一位“将哲学引入基督教教义的研究”的集大成者。他的神学思想和哲学、美学观念在基督教世界中一直占据着崇高而权威的地位。另外，他对基督教神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和创建还对整个西方的思想与文化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Tagaste）。母亲慕尼加（Monica）是基督教徒，而在城镇政府中任职的父亲巴特利西乌斯（Patricius）则是一位异教徒。也就是说，奥古斯丁自小生活在不同信仰的家庭中。通过对母亲信教行为的耳濡目染，他开始对基督教有些感性的认识与了解。然而，望子成龙的父亲却一直坚持对他实行传统的异教教育，这又使奥古斯丁对基督教产生了轻视、怠慢的心理。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奥古斯丁为何绕了一个大圈子后，才皈依了基督教的内在心理轨迹。

在公元300多年以前，塔加斯特城便被划进了罗马帝国的版图，所以被父亲寄予厚望的奥古斯丁从小接受过良好且系统的罗马“三级制”式教育。在他7岁时，进入当地小学，学习拉丁文、初等算术和希腊文。他12岁时，前往马都拉城，学习文法、诗歌和历史等。在此阶段中，他还阅读了大量的拉丁文学作品，特别是维吉尔的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6岁时，由于家境的原因，在家辍学一年。一年后，他被父亲送往北非的学术中心迦太基城读书，主修修辞学和哲学。修辞学即是雄辩术，经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奥古斯丁的口才和逻辑思辨都得到了极好的锻炼。重要的是，这期间学校所列的一本必读书，即罗马作家西塞罗的《荷尔顿西乌斯》使奥古斯丁第一次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经过一番比较与思考，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推举善恶二元论的摩尼教，点燃了潜伏于他胸中的追求智慧与真理的愿望。毕业后，奥古斯丁曾先后在迦太基和罗马的米兰城任雄辩术教授，教授修辞与哲学课程。

应该说，奥古斯丁的一生是极其复杂、矛盾和富于戏剧性的一生：他既有过沉湎于情欲、肉欲的玩世不恭，又有过圣人般的虔诚与专注；他曾唾弃、反对基督教，但又倾其后半生的心血把基督教阐释为最符合真理的教派。

若以时间为界标，公元**387**年是他生命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时已经**33**岁，历经精神、信仰煎熬的奥古斯丁，在米兰城的基督教教主安布罗西乌斯（Ambroasius，公元339—397）以及新柏拉图派、怀疑派著作的影响和母亲无数次的含泪祈祷下，终于告别了以往轻薄、荒诞的生活和信奉了九年的摩尼教，正式接受了洗礼，成为一名虔诚、笃信与寻求上帝真理的基督教徒。之后，他返回家乡塔迦斯特城，以祈祷、读经、著述等隐居方式度日。三年后，奥古斯丁前往非洲的希波（Hippo）城，先是担任该城教会的长老，后担任副主教。公元**396**年，希波城主教瓦勒里去世后，他接任了主教的位置。在与其他异端教派的论战与争辩中，他把其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基督教，并写下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公元**430**年**8**月**28**日，**76**岁高龄的奥古斯丁因病去世，进入了他所追随的永恒天国之中。

奥古斯丁的著作：

奥古斯丁一生著述甚丰，据其本人晚年在《订正》中统计，他所写下的著作共计**93种**，多达**232部**，主要著作有《论自由意志》（*On Free Will, 386-388*）、《忏悔录》（*Confessions, 397-401*）、《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 399-422*）、《上帝之城》（*On the City of God, 413-427*）等。由于时间久远，能完整流传至今的只有《忏悔录》和《上帝之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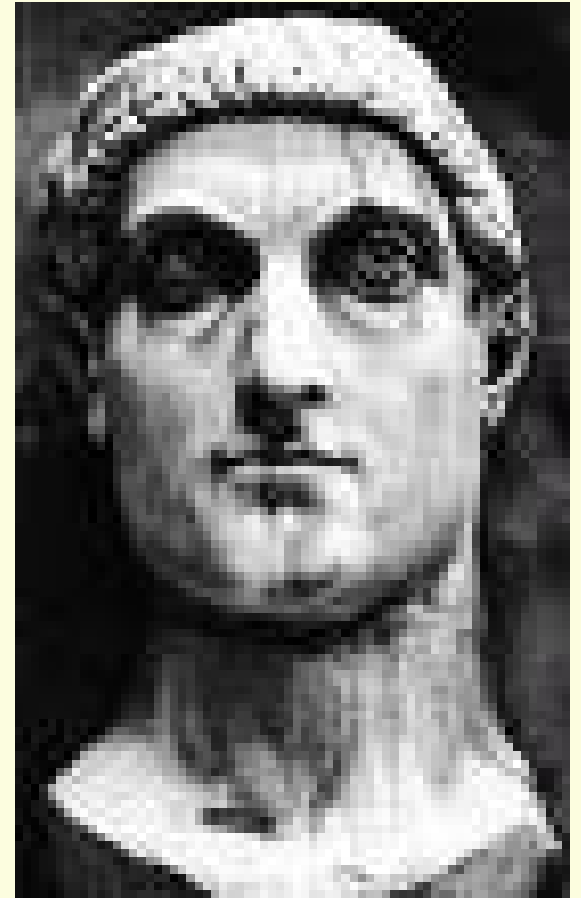
评价：生活于两个时代之交的奥古斯丁，不论是在欧洲宗教思想史上，还是文学创作上都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他被誉为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是另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他是古代基督教作家中的最后一人，同时也是中世纪神学的开路先锋。”这种评价本身意味着奥古斯丁的神学、美学体系具有两个时代的思想特征。具体地说，作为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研究、反思与总结者，他的不少美学观点，如美与和谐、美与比例等的关系认识，就是对其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当然，奥古斯丁之所以能成为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更在于他对自希腊以来文化传统的革新与颠覆。其主要标志是，他瓦解了自古希腊人以来的原有创世观念。如果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意味着创造必须要以某种“‘根据’为前提”的话，那么奥古斯丁对于上帝创世说则予以了重新的阐释，即他认为“真正的‘创造’，并不是对于先在物的模仿，而是创造着自身意志的结果。”

显然，在奥古斯丁这里，上帝或者说神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特权，即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神根据其意志来创造的，“天地存在着，天地高呼说它们是受造的，因为它们在变化。……是你，主，创造了天地；你是美，因为它们是美丽的；你是善，因为它们是好的；你实在，因为它们存在，但它们的美、善、存在，并不和创造者一样；相形之下，它们并不美，并不善，并不存在。感谢你，这一切我们知道，但我们的知识和你的知识相较，还不过是无知。”天地、美善、存在，知识和我们都是上帝，即“主”所亲手创造与赋予的。可见，构成奥古斯丁神学、美学思想体系核心的并不是看得见的人类和万物，而是形而上的“主”。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在奥古斯丁对于神圣照管与救恩的神恩独作观念中，神是独一无二的主动者与能力来源；而所有人类，无论是集体或个人，都是神施行恩典或忿怒的工具与方法。”《上帝之城》就是这样的一首献给和捍卫神的颂歌。

奥古斯丁的世界观和美学观

奥古斯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代表。他提出“神之都”代替“地之都”，也就是以教会的统治代替世俗国家的统治，并断言前者永在，后者灭亡。他早年曾宣扬希腊毕达哥拉斯关于美为事物的整一、和谐说，后转向新柏拉图主义，认为整一、和谐是上帝创造的，美的根源在神，宣称文艺的对象是上帝，不是现实世界。他在《忏悔录》中谴责自己早年的美学观是世俗的，是犯罪的，并认为真理、至善、至美属于上帝，而学习文化，阅读文学作品，引起激情，为悲剧中的人物落泪，则使“自我”远离上帝；上帝所造的万物中也包括低级美，即世俗的、形式的和谐，如果为后者的轮廓、色彩所困惑，便是离开“非肉体实质”，离开真理。

奥古斯丁在批判世俗文艺的同时，触及了一些理论问题。例如，他认为，“一件（世俗）艺术品的本身价值在于它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虚构。”“艺术家倘若忠于自己，就必须虚构。”他虽谴责“虚构”，却讲到了想象和艺术构思。又如他还主张，思而得之胜于一读就懂，前者予人以更多愉快。圣书上的图画通过形象来宣扬教义，例如画些齿状的东西，使人联想到那些“殉道者”如以利齿消除现世的罪过，在圣徒的上端画剪掉了毛的羊，说明圣徒必须从现世的重负下解脱出来方能为上帝服务。这些言论涉及到文艺中象征和形象等问题。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在奥古斯丁的所有著作中，《忏悔录》一书占有非常独特的地位。该书不但详细记录了他一生的经历，而且还忠实记录下了他的灵魂转变过程以及写作此书时的思想状况。为我们研究奥古斯丁本人及其那个遥远的时代提供了一份难得的资料。



《忏悔录》的原名是“*Confessiones*”，这个词原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承认、认罪，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成“忏悔录”是恰如其分的。在转向基督教之前，奥古斯丁曾有过一段漫长迷惘、痛苦和迷失的日子。他和家乡的孩子们一起以偷盗来取乐；在迦太基雄辩学校读书时，他被疯狂燃烧的情欲笼罩着，曾和一个女人同居，并生有一个儿子。而且，后来抛弃了这个女人，又和别人订婚，但在等待婚礼的过程中，因耐不住寂寞又与其他女人有染等。该书就是奥古斯丁对自己的前半生沉湎于荒诞、罪恶世俗生活的解剖与忏悔。然而，这个拉丁文除了有“忏悔”之意外，还另含歌功颂德的意思。阅读全书，不难发现，除了自责、忏悔以外，该书的另一重心是表达了对“天主”的崇信与膜拜，如“我的好天主、万有中最美善的，万有的创造者，我的至善，我真正的至宝。”书中这类歌颂上帝恩德的话比比皆是。从这一层面看，翻译成“忏悔录”只凸现了前者，而忽略了后一种意义上的写作。

《忏悔录》共有十三卷，由卷一到卷十三构成。由于该书是一部自传体作品，所以在写作上严格按照了时间的线索，即从出生，到求学、父亲、母亲病逝，再到皈依天主、交代撰写此书的目的等。本书所选出的“卷二”，就是作者对往昔自己“污秽”、“纵情肉欲”以及“以地狱的快乐为满足”和“各式各样的黑暗恋爱”进行忏悔。在该部分中，作者主要围绕着16岁时的一次“偷盗”事件来写的。从马都拉城毕业后，按计划奥古斯丁本应继续到迦太基去读书，但由于家中经济拮据不得不停学一年。就在这一年中，已发育成熟，有了青春苦闷的奥古斯丁与伙伴们到处游荡，听着同伴们竞相夸耀自己的“丑史”，他为自己的“天真”和“纯洁”感到前所未有的羞愧。为了不使自己显得太无知，他开始为学会坏而学坏。在一个深夜，他与闲游浪荡的同伴把梨树上的所有果子都摇晃了下来，不是为了吃，而只是为了证明敢于去做违禁的事情。

偷果之事本是微不足道的事件，奥古斯丁为何念念不忘，还把当时的动机与感受慢慢道来，细细分析。应该说，这与他对自我的认识有关，即他认为果树事件是其背离上帝，踏上歧途的开始。为了获得上帝的谅解和爱怜，他必须要向上帝如实地坦白一切。正如作者在本卷的开篇即言明回忆过去，并不是“流连以往，而是为了爱你，我的天主。”《忏悔录》就是对自己前半生荒诞、罪恶生活的忏悔。

《忏悔录》虽然写作的时间久远，但由于作者采取敞开胸怀与灵魂的祷告方式，所以在事件的讲述与语言的使用上都具有情感真挚、文字通达，神采飞扬，一气呵成的特点。这种写法不但使读者阅读起来没有什么障碍，重要的是，还开创了西方忏悔文学的先河，后来卢梭、托尔斯泰的《忏悔录》都与这本书有着不解的渊源。

《忏悔录》中的文艺思想

1. 美在于事物的整体，在于它的和谐统一；
2. 反对虚构的艺术，反对世俗文艺；
3. 丑是形成美的一种因素。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 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军事学家、诗人和剧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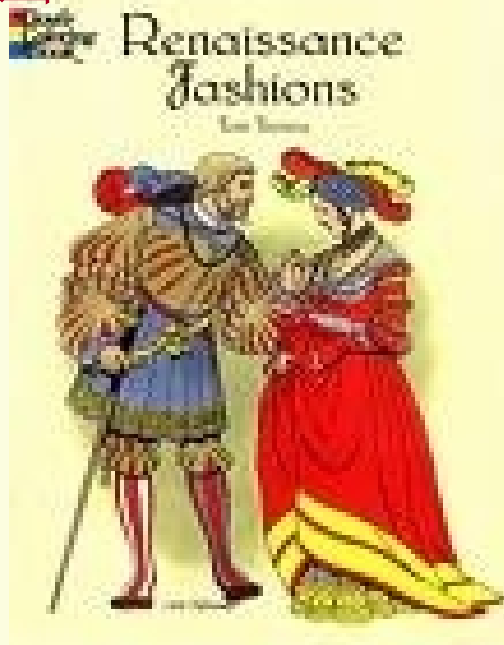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Niccolo
Machiavelli 1469—
1527)

• 关于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期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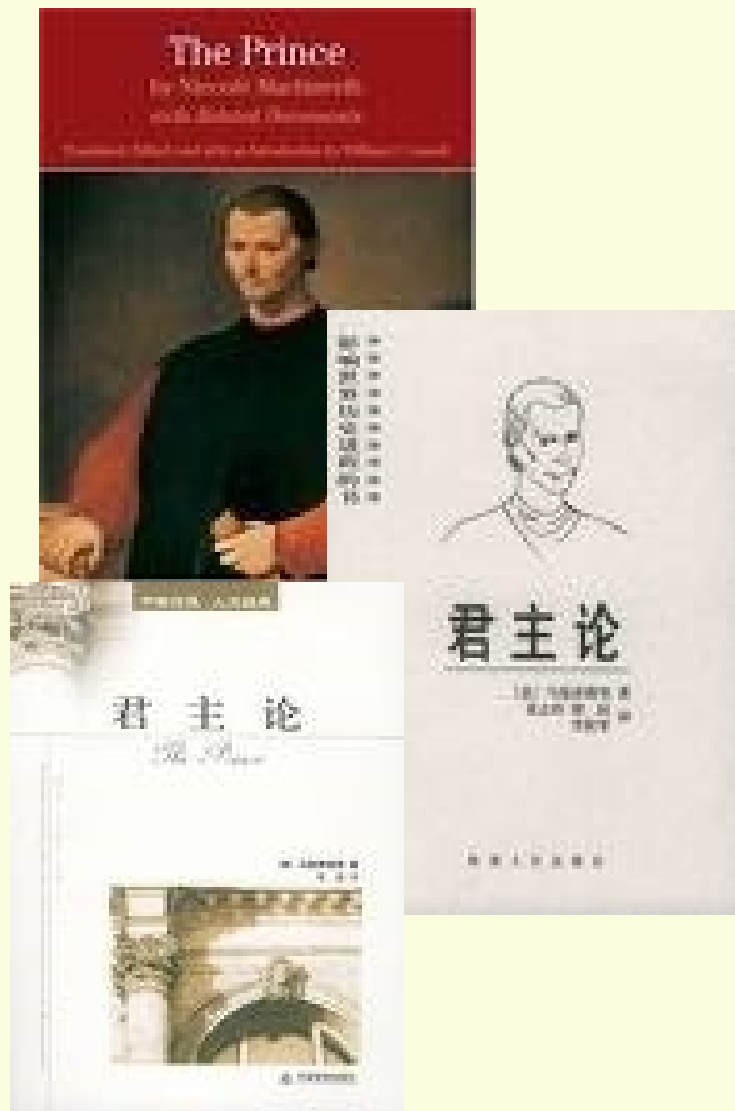
文艺复兴时期绘画



文艺复兴时期服装

生平：尼科洛·马基雅维里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军事学家、诗人和剧作家。马基雅维里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他父亲贝尔纳多是法学博士、律师；他母亲也有着良好的教育，能诗会文。马基雅维里七岁入学，约在十二岁时就能用拉丁语作文。他熟习拉丁文和意大利的古典文学、史学。在1494年到1512年间，他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效力，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151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覆灭，他的十四年政治生涯随之结束。不过，他没有因为仕途的失意而自暴自弃，而是将精力投入到著书立说中去，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财富。主要著作有《君主论》（*The Prince*）、《李维史论》（*Discourses on Livy*）、《战争的艺术》（*The Art of War*）、《曼陀罗花》（*La Mandragola*）等。

本书所选的第一篇文章是《君主论》的第十六章。马基雅维里在这里探讨的问题是君主花钱应当慷慨还是吝啬。马基雅维里发现慷慨和吝啬的关系是辩证的，一个大方的君主，往往容易把自己的财力耗尽，最后只能面临两难的选择——要么收回慷慨，并在巨大落差之中显得特别吝啬；要么横征暴敛，成为人民眼中的暴君。他发现，很多成功的国王，如法国的路易十二、西班牙的费尔迪南多等都是通过节约而成就大业的，因为节约的国王不会给国人增加负担，在需要钱的关键时刻可以做到出手大方。



马基雅维里还这样评价吝啬的国君：“这样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慷慨的，因为他没有增加他们的负担，对于没有被施与的人来说是吝啬的，但这些人毕竟为数甚少。”可见吝啬不是什么坏事。当然，君主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越吝啬越好，例如说，想当君主而尚未当上的人应当尽量显得大方，否则就不能获得支持，而一旦当上了君主，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还有，如果所花的钱是掠夺来的，既不是自己的，也不是本国人民的，那就应当越大方越好。所以马基雅维里清楚地看到了慷慨和吝啬之间的辩证关系：慷慨必然耗尽财力，最后走向吝啬；而吝啬能够集聚财力，最后在成就一些伟大事业的时候，不会增加人民的负担，结果反而显得慷慨。

第二篇是该书的第十七章。马基雅维里在这里谈论的是君主应当被爱戴好，还是被畏惧好。爱戴和畏惧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切萨雷·博尔贾是人们公认的残酷君主，但是“他的残酷却恢复了罗马尼阿的秩序，把它统一起来，并且迎来了和平与忠诚。”相比之下，佛罗伦萨的统治者为了避免残酷，对国内的派系斗争采取容忍的态度，结果酿成流血、掠夺的惨局。前者虽然残酷，结果比后者所谓的仁慈更有利于国家。通过残酷的手段而取得伟大成就的人比比皆是，但残酷也应当注意分寸，不能激起民众的憎恨。在详细探讨了吝啬和慷慨的利弊之后，他给君主提出了一个很著名的建议：“由于人们爱戴君主，基于他们自己的方便，而畏惧则基于君主的方便，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于自己控制的范围之内，而不应当立足于他人控制的范围之内。”在马氏看来，君主只有这样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国家。

第三篇选自该书的第十八章，谈的是君主是否应该守信用的问题。马基雅维里认为君主不应该局限于法律的手段来治理国家，还应使用野兽的方法，即运用武力。在各种野兽中，他所推崇的是狐狸和狮子：“君主既然必需懂得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该效法狐狸和狮子，因为狮子不能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不能抵御狼。”他认为用兽性武装起来的君主在必要的时候不应当守信用：“因此，一个审慎的君主不能守信用，也不应该守信用，当这样做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做出诺言的理由不复存在的时候。”这种不守信用的君主往往取得成功，例如说，亚历山大六世就是这么一个君王，“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加有力地做出保证，比他更加信誓旦旦地肯定一件事情，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食言而肥；然而他的欺骗总是如愿成功，因为他深知人世的这一面。”

像亚历山大六世一样的君主还很多；纵观历史上所有的君主，往往是那些诡计多端的战胜重信用的。所以聪明的君主不应该重信用。但公开承认自己不守信用是愚蠢的，君主总是需要装作很忠厚的样子，其原因在于，“如果具备这些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马基雅维里所揭示的道理是很深刻的，但也的确让人感到非常胆战心寒。

马基雅维里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在英语中Machiavellian这个词与狡猾、不择手段等意思相联系。也许在世界上的很多语言当中都是如此。马基雅维里死后受到了激烈的抨击。莎士比亚称他为“凶残的马基雅维里”，有的神学家把《君主论》看作“邪恶的圣经”，道德家简提利特指责他的政治思想为“一种邪恶的学说”。但他所遭到的这些批评有着很不合理的地方。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908055045031007007>